

女巫、叛国与虚无：《麦克白》批评转向刍议

徐 嘉

〔摘要〕 本文从莎剧《麦克白》三个常见研究主题——女巫、叛国和人生的虚无入手，探讨了《麦》批评近年来的研究转向，即：研究内容上，回归日常文化和政治生活；在研究模式上，摒弃“高端”理论方法，引入政治、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新历史主义“颠覆/抑制”的二元对立史观受到挑战；在研究导向上，关注文学作品的当下性和现实意义，尤其是对暴力和恐怖主义问题的反思。《麦》新时期研究主题的转向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持续深入，也与后 911 时期国际政治格局的改变、世界多元化和价值冲突直接相关。

〔关键词〕 《麦克白》；女巫；叛国；虚无；转向

〔中图分类号〕 I561 - 1. 0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4769 (2019) 05 - 0067 - 07

《麦克白》^①（下称《麦》）第五幕，侍女引领一位医生为麦克白夫人看病。在目睹麦克白夫人梦游、洗手、呓语等种种怪异行为之后，医生大感苦楚：

反常的行为引起了反常的纷扰；良心负疚的人往往会向无言的衾枕泄漏他们的秘密；她需要教士的训诲甚于医生的诊视。上帝，上帝饶恕我们一切世人！凡是伤害她自己的东西全都要从她手边拿开；随时看顾着她。好，晚安！她扰乱了我的心，迷惑了我的眼睛。我心里所想到的，却不敢把它吐出嘴唇。（5. 1. 71 - 5）

医生清楚麦克白夫人的病症所在，却苦于无法言说，权宜之下只能治标不治本地提醒侍女将“凡是伤害她自己的东西全都要从她手边拿开”。侍女曾对医生表示“我可不能把她的话照样告诉您”（5. 1. 16），表明她早已知晓内情。此时她听着麦克白夫人在梦游中“说了她所不应该说的话”（45），明白“她的心里蕴蓄着无限的凄

苦”（50），内心惨然，却依然无法言说。虽然两个人都保持了沉默，但又隐晦提及“外边很多骇人听闻的流言”（68），显示麦克白夫妇的秘密已然成了国人皆知的秘密，这个不可言说的秘密让所有知道的人乃至整个苏格兰都生了病。

不仅如此，麦克白在杀死邓肯后感叹自己说不出“阿门”（2. 2. 28 - 9），三女巫被麦克白称作“闪烁其词的预言者”（imperfect speakers, 1. 3. 70），麦克白说人生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5. 5. 26），种种“不敢说”“不能说”“不全说”“被言说”，让《麦》抗拒一切阐释，将对意义的追索牢牢封锁在戏剧自身。古往今来的评论家从文本内外入手，不断尝试接近“真相”，但这个秘密不仅没有越来越明白，反而延伸到了剧本之外——如今，英美剧院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传统，就是不能说出“麦克白”一词，只能代之以“那个名字”（That name）或“苏格兰王”（the Scottish king），否则剧场和演员就会遭遇厄运，此即著名的“麦克白的诅咒”（the Macbeth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研究基金项目“莎士比亚戏剧与早期现代英国教育变革”（16YJC752023）

〔作者简介〕 徐嘉，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1。

curse)。②

不可言说的秘密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该剧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但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它是否真的有意义，却不如秘密的存在本身那么迷人。作为一种解“秘”方式，一方面，文学批评与作品始终存在距离，文本的意义只能无限接近，却无法完全捕捉，很多时候文学批评可能只是文学作品“外边很多骇人听闻的流言”，另一方面，文学批评方式随着时间、空间转变，也丰富着我们对文学作品和当下生活的理解。本文从近年来《麦》的三个常见研究主题——女巫、叛国和虚无的人生入手，探索文学批评重点和方式的转向——从某种意义上讲，从研究主题而非理论视角切入本话题，本身就是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向，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注意到的，“过去20年间所发生的是，人们可能会冒险称之为‘纯粹’或‘高端’理论的东西不再那么流行了”，而“这种向着日常的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回归显然应该受到欢迎。”③

一、“制造”女巫与 作为文学研究的历史研究

《麦》中的三女巫研究历久弥新。超自然的女巫如泡沫般“好像有形的实体融化了似的，如同呼吸融入了风中”（1.3.81-2），她们的古怪长相、滑稽语言、神秘预言和在情节安排、戏剧结构、人物性格、作品主题上的多重作用曾引发方方面面的讨论。进入新世纪，对女巫的讨论愈加丰富多元，尤其是受到精神分析和历史研究的跨学科影响。一些学者引入拉康式的精神分析解读，认为女巫古怪的言语和行为源于创伤（trauma）所引发的精神病，如三女巫的胡子（with beard, 1.3.45）就被认为是多毛症（Hypertrichosis）的表现，病因是在战争中或战后初期，由于女性进入传统的男性行业、承担原本的男性工作所引发的体貌特征男性化④；也有人认为，女巫的预言并不存在，三女巫只是麦克白内心邪恶所投射的镜像，而《麦》实际上展示了“文艺复兴时期幻想对人的伤害”⑤，还有人认为女巫（包括麦克白夫人）的施咒其实是患了歇斯底里症（Hysteria），这种疾病也被认为是人为建构的一种女性疾病。⑥精神分析也延续到了《麦》的电影批评中。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ński）导演的《麦克白》（1971）被认为一方面深受他的同胞、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扬·科特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在这个解释中加上电影导演亲身

经历的恐怖事件——大屠杀对他的家庭的影响，波兰斯基先是被纳粹分子和苏联人蹂躏，后来他的妻子又被疯狂的曼森帮虐杀。”⑦将《麦》与创伤理论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麦》写于火药阴谋（Gunpowder Plot）之后，属于大型社会恶性事件之后的作品。而经历了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文学批评“对讨论莎士比亚文本在后911时期的美国学术界的特定领域中会产生哪些新的阐释张力兴趣不大，而更偏向于思考莎士比亚文本可能会以何种方式恢复我们所缺失的现实（the Real）精髓，以便我们也可以‘分享历史的悲痛’”。⑧在2006年的电影《麦克白》中，导演杰弗里·莱特（Geoffrey Wright）创造性地将三女巫呈现为性感而堕落的女中学生，这群女生“对暴力和肉欲的热爱与她们天使般的面孔构成了反差”，富有新意地阐释了“美即是丑，丑即是美”的主题，但莱特的阐释（电影改编同样是一种文本阐释）体现出高度的娱乐性和消费主义特征，尤其是“将人格化的邪恶等同于妖魔化和高度女性化的女性气质”，因而毁誉参半。⑨

历史研究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不仅显而易见，而且渊源已久。事实上，以蒂利亚德（E. M. W. Tillyard）为代表的20世纪莎学研究者的一大工作范式就是将莎剧与其素材对比，探讨莎士比亚对于伊丽莎白时期世界图景的呈现。进入新世纪，莎学批评文史互证的趋势更为明显，文学和历史的联系更加密切，如莎士比亚研究最重要的工作文本——阿登第三版《麦》就将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的《巫术的兴衰》和迈克法伦（A. D. J. Macfarlane）的《都铎与斯图亚特时期的巫术》定义为“标准历史”⑩，广泛引用。更重要的是，历史学家将“听差精灵”还原为“孤独老妇所拥有的唯一朋友，给它们取的名字也不过表明了其感情深厚的关系”，无关魔力；将女巫的夜间聚会还原为“流浪的乞丐们”“挤别人家的牛奶，集体睡在谷仓或户外，晚上吹笛跳舞”的集体活动⑪；将女巫的丑陋和衣衫褴褛还原为很多寡居的英国乡村老妇由于生活贫困，“惯于挨家挨户地讨要一满壶牛奶、酵母、饮料、粥等救济品——没有这些，她们就活不下去”⑫；也帮助文学研究者将《麦》作为早期现代英国乡村共同体建构的一部分——这些孤苦伶仃的老太婆大多无儿无女，不属于任何的团体和组织，她们衣衫褴褛、以乞讨为生，有的还口齿不清，容易招致乡民反感，于是这些弱者、他者被有意地“制造”成了强大的邪恶代言人。但正如历史学

家罗伯特·普尔 (Robert Poole) 所注意到的, “自从基思·托马斯的经典之作《巫术的兴衰》问世以来, 英国巫术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成了‘乡村紧张关系’ (village tension) 的副产品”, 巫术被具象化为“威胁式的乞讨、加剧的仇恨和邻里冲突”, “在这些冲突中, 年老、贫穷、不安和好争吵的妇女最为危险。”^⑩对《麦》《裘里斯·恺撒》《暴风雨》等文学作品中的巫术进行文史互证的研究, 将巫术主题扩展到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之中。女巫不再被简单视为对生命和财产的威胁, 而是成了对整个伊丽莎白时期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社会生活的常见主题。《麦》中三女巫投入坍塌的手指可能影射了早期现代英国的母亲杀婴案件^⑪; 而詹姆斯一世时期戏剧中的女巫和“被妖魔化的苏格兰”则可能体现出当时的英国人“面对大批苏格兰移民的涌入, 焦急地寻求保留英格兰的独特环境和特征”的心理, “他们顽固地不愿承认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是一样的”^⑫; 爱丁堡大学的英国文学博士斯伯托 (Stephanie Irene Spoto) 研究了《麦》对女巫和女巫化的麦克白夫人的性别描写, 发现女巫的形象呈现出许多所谓“女性不宜”的行为, “如不愿结婚、年老、脾气暴躁、特别是滥交”^⑬, 而结合纳尔斯伯勒森林 (Knaresborough Forest) 等地的女巫境遇, 她发现很多妇女承认乃至主动宣称自己是女巫, 仅仅因为魔法是她们在村庄和社区获得物质收入和精神尊重的唯一途径, 而对那些未婚的老妇人来讲, 就更是如此。^⑭换言之, 巫术已成为女性权力斗争的一种手段。

《麦克白》《浮士德博士》《暴风雨》和《埃德蒙顿的女巫》等^⑮层出不穷的“巫术剧”模糊了现实与戏剧、真实与虚构、证据与幻象的区别, 推动巫术成为一种强大而现实的力量, 而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结合历史研究, 将巫术呈现为伊丽莎白后期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由于女王的继承人问题、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问题和火药阴谋等诸多社会问题和恐怖事件所引发的社会焦虑的出口: “女巫和恶魔附体者在早期现代文化和戏剧中的存在, 既可以通过质疑那些当权者的合法性和道德优越性来颠覆政治权威, 同时又可以通过将那些被认为是合适的政治霸权具体化来整合社会。与其将‘干净’和‘肮脏’、‘净化’和‘污秽’、‘合法’和‘颠覆’的类别视为根本分歧, 不如将这些类别视为在一种几乎可互相替代的经济关系中运作。”^⑯

总体而言, 近年来的文学批评已不再将三女

巫视为邪恶的代言人, 而是将之解读为某种精神疾患或早期现代英国社会历史文化建构的一部分, 即将女巫视为一种“隐喻”, 关注“制造”女巫背后的病理、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 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评论家提倡将文学放在社会史、史学史、文化史的语境中来加以研究, 认为文学与历史之间不仅有指涉和反映, 还存在着干预和改写, 对21世纪的莎士比亚批评仍然影响巨大。但较之新历史主义盛行的20世纪90年代, 新时期的莎学批评呈现出重实证、细节化、跨学科的特点, 拉康精神分析和历史研究成果等丰富了文学批评的视野、内容和方法, 同时文本不再被简单地处理为“抑制/颠覆”的二元对立模式, 而是努力呈现出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期复杂的社会矛盾、价值冲突、协商与和解。有学者提出, “正是由于历史研究范式自身的变化及研究者历史视野的扩大, 才使早期现代英格兰文学研究尤其是莎士比亚研究出现了一个最新的发展动向, 即‘作为历史研究的文学研究’, 它或能促使文学研究者反思文学作品‘文学性’的历史性, 帮助他们打破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界限, 发展‘作为文学研究的历史研究’”^⑰, 但在具体操作中, 相对于社会、历史研究对文学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文学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几乎仅限于提供文学作品本身, 文学批评的影响虽有扩大, 但仍然非常有限。

二、欲言又止的“叛国”政治

里德 (B. L. Reid) 曾指出, “《麦》是一个罪与罚的故事, 讨论的是失去和重获恩典。”^⑱这个观点一度影响广泛, 但近年来却不断受到质疑, 因为它忽视了《麦》剧中隐藏的一处重要置换——虽然正义战胜了邪恶, 叛国之罪得以清算, 但邓肯的子嗣并未重掌王权, 反而是班柯的后代得到了王位。乔治·华尔顿·威廉姆斯 (George Walton Williams) 指出, 莎士比亚安排三女巫预言班柯的子孙当王, 看似是因为班柯是詹姆斯的祖先, 这样做可以取悦詹姆斯一世, 但这一说法的疑点在于, 邓肯和马尔康也是詹姆斯的祖先——詹姆斯宣称自己是公元前330年繁荣一时的苏格兰第一任国王弗格斯一世 (King Fergus I) 的后裔, 詹姆斯是弗格斯的第108代后裔, 马尔康是第86代, 邓肯是第84代——如此说来, 邓肯的鬼魂同样可以建构祖先的合法性, 且比班柯的鬼魂更具报应感, 也更贴近历史。威廉姆斯认为, 莎士比亚将班柯的故事插入麦克白的传说、

并将班柯置于首要和突出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詹姆斯和班柯同属斯图亚特家族，詹姆斯一世想强调他的斯图亚特血统。^②的确，詹姆斯一世的“和平继位”和他“重新温和而非暴力地”看待王位继承权，如科兰德（Stuart M. Kurland）所言，“都是后来的事”。伊丽莎白时代后期，曾有十几个人宣称拥有王位继承权，斯图亚特夫人、格雷、德比伯爵和西班牙国王腓力普二世（或他的女儿）都是王位的有力竞争者，追溯起来他们都是亨利七世的后人。^③强调斯图亚特血统，即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与英格兰亨利七世女儿的后代的血统，正是詹姆斯作为外国人继承英国王位、弥合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关键。于是，谋杀国王变成了次要情节，谋杀班柯却反而占据了国王应有的核心位置；班柯的鬼魂重返盛宴，将麦克白从王位上推了下来，而邓肯的鬼魂则被偷偷置换出舞台中心，成了一个游荡在戏剧边缘的孤魂野鬼。这样的“选择”祖先、“纠正”血统，实际上描述的是一场对历史的重构，一次隐秘的“叛国”。

近年来，文学研究者进一步挖掘文本，深入探索剧作家及其时代对“叛国”抱持的模棱两可态度。总的来说，这些讨论可归纳为三点：

首先，麦克白的评价问题。麦克白为国王平叛，被邓肯赞为“英勇的表弟”“尊贵的壮士”（1.2.24），但国王麦克白平叛失败，却被马尔康斥为“已死的屠夫”（5.9.35）。同为平叛，是什么决定了这样的天壤之别？又是谁决定了评价的价值取向？《莎士比亚与恐怖主义》一文提出，虽然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恐怖主义”这个词并不存在，但恐怖主义体现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而莎士比亚通过区分麦克白的“非法暴力”和马尔康的“合法暴力”，也加入了有关恐怖主义的讨论：“尽管每一种形式的暴力都涉及杀害一位当选国王，但一种是公然叛国，另一种，至少从斯图亚特王朝的目的论以及麦克德夫和马尔康宣称的无私的爱国主义来看，是建立国家。”^④在莎士比亚笔下的苏格兰，暴力成为一种被垄断的权力，道德的意义经受了双重的考验，善恶对立看似明显，实际上却与女巫生存的超自然世界并无本质区别。这一切困惑都隐藏在“正义战胜邪恶”的旗帜之下，让人不安，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其次，叛乱的性质问题。《麦》始于叛乱，亦终于叛乱。开场时，麦克唐华德“征调了西方各岛上的轻重步兵”（1.2.12-13）发动叛乱，挪威国君“看见有机可乘”，“调了一批甲械精良

的生力军又向我们开始一次新的猛攻”（1.2.31-33），“最奸恶的叛徒考特爵士”（1.2.53-54）也乘机参与进来，可谓一波叛乱未平，另一波叛乱又起。而当叛乱终于平定，拨乱反正的麦克白又发动了叛乱。从某种程度来讲，该剧剧终无非又是一场叛乱——只不过国王换成了麦克白，叛国者换成了邓肯的儿子马尔康。即便在平叛之后，该剧亦陷入了新的危机——开场女巫三拜麦克白，换成了剧终众人三拜马尔康。这样的安排，引发了两点疑问：第一，如果邓肯真如麦克白所说的“政治清明”，那么《麦》剧开场为何会出现苏格兰内外交困、战争四起的险境？第二，马尔康取代麦克白成为新的苏格兰王，能否彻底解除国家的混乱状况？有意思的是，在波兰斯基血腥的《麦克白》的结尾，邓肯的另一个儿子、马尔康的兄弟道纳本也和麦克白一样走进黑暗森林寻找三女巫，预示着一场新叛乱的开始。

再次，马尔康讨伐麦克白的合法性问题。邓肯提名马尔康为王储，明显违背了凯尔特人的轮流继承制（tanistry），忽视了麦克白对王位的合法主张，这一点已成为学界共识。^⑤而正如大卫·斯科特·卡斯坦（David Scott Kastan）提及，尽管麦克白是篡位为王，但他仍是一位受膏的国君，按照詹姆斯《自由君主制的根本大法》（the True Law of Free Monarchies, 1598）中提出的无条件服从君主原则——“无论国王是否邪恶，都不能由那些受他审判之人来审判”^⑥，马尔康必须服从麦克白的统治，他的起兵本质上等同于叛国。此外，流亡英国的马尔康为试探麦克德夫的来意，故意诽谤自己，将谎言和隐瞒用作维护君主统治的武器，尤其提出君主因荒淫无道而“叛国”的可能性，质疑了神圣君主的存在。正如瑞贝卡·莱蒙（Rebecca Lemon）所言，这一幕极具悲剧性，因为它表明“只有通过使用叛徒的手段，国王才能战胜苏格兰重重雾霾的荒野。”^⑦

“叛国”话题成为近年来《麦》研究的一大热点，可能来自近年来学界对国家和民族建构问题的关注。按照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莎士比亚的自由》（*Shakespeare's Freedom*）的说法，莎士比亚在麦克白身上发现了一种没有“充分道德目标”的野心（“an ethically adequate object” for human ambition），这种野心让麦克白自己也深受折磨^⑧，至于他有没有“叛国”，新时期对《麦》的政治解读呈现出多元的价值观和自由化倾向——他们关注的不再是麦克白有没有叛国，而是“叛国”是否真正存在。对“叛国”的重新

界定体现了西方世界对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理解——麦克白自由地追求个人目标，不愿意“服从自己之外的任何秩序”^⑧，乃至蔑视时间运行的逻辑：“对麦克白来说，承认间隔的可能性——时间流的存在，明天和过去的间隔——会导向暗无天日的虚无主义，什么都不复存在。”^⑨新世纪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也加剧了对西方人文学者价值观的冲击，有学者甚至直接将麦克白的野心与911袭击事件中的恐怖分子画上等号，认为麦克白本质上是个圣战者，至少是个“勇敢的自杀者”，他“受到怂恿，与异教徒战斗，直到再无不信之人。”^⑩但此类解读的危险在于，若一味放大文本的政治性和现实联系，不仅会造成过度解读，还导致文学批评丧失“文学性”，沦为政治和历史研究的素材和工具。

三、虚无的人生与《论邪恶》

麦克白最著名的宣言“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5.5.19-28）以其充满诗意的语言和对人生境遇的隐喻，不仅吸引了众多读者和观众，而且让威廉·福克纳引为《喧哗与骚动》的书名。麦克白从“没有充分道德目标的野心”，到产生“要是干了以后就完了，那么还是快一点干”（1.7.1）的念头，再到陷入“流血必须引起流血”（3.4.120）的循环，接连杀死了班柯、班柯的后人、自己的良心，最后沦为历史循环的一部分，丧失了人类的情感和为人的意义，乃至在战场胜负未分之时，麦克白就已宣告了自己虚无主义的未来。

“追问人生的意义是人类永恒的可能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要素之一。”^⑪但对于麦克白来讲，人生却变成了一场喧哗的闹剧，人的欲望变成了虚空和捕风，而神创世界时“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⑫变成了“找不到一点意义”。在2007年出版的《人生的意义》中，伊格尔顿详细解读了麦克白的这段台词，认为这段话至少体现了两种“无意义”（meaninglessness）的概念，一种是存在主义式的，即人的存在是一出虚无空洞的闹剧，意义丰富，或华而不实。另一个概念则是语义学上的，指人生难以理解，因而毫无意义。^⑬在三年之后的《论邪恶》（2010）中，伊格尔顿又拓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无意义代表邪恶，代表毁灭，因为“凡诞生之物，皆适于摧毁，因之毫无价值。”他借用歌德的《浮士德》中梅菲斯特菲尔

的话指出，邪恶真正可怕的力量在于摧毁。“对浮士德式的心灵而言，与无限的万物相比，任何单个的成就必定显得无足轻重。”^⑭在不受道德约束的野心面前，人类如此渺小，一切都显得无关紧要，因而毁灭一切也在所不惜。对于麦克白而言，既然万物毫无价值，那么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毁灭——这就是邪恶。

伊格尔顿将“无意义”与“邪恶”联系起来，同样是在911事件之后对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重新思考。伊格尔顿认为《麦》中的三女巫是那个“沉迷于身份地位的政权的流放者”，认为她们代表了“对任何可以想到的社会秩序的威胁。”^⑮若看到听差精灵不过是常见的家畜、三女巫只是被剥夺了人性、披上魔鬼外衣的普通妇人，那么很显然，“制造女巫”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极大的邪恶，因为它本质上是一场发生在文明社会的同类相残，是一群人对另一群无力为自己言说的弱者和他者的暴政，而《麦》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也参与了这一暴政。伊格尔顿引用亨利·詹姆斯的评论，批评波德莱尔创作的表面性：“对他来说，邪恶始于外部，而非内在，它主要包含着大量骇人的景象和不洁的家具……邪恶被呈现为流血、腐肉和身体疾患之事件……那里肯定有发臭的尸体、挨饿的妓女以及让诗人灵感迸发的、喝光的鸦片酞酒瓶。”^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麦》，那么剧中女巫的丑陋和敌意、麦克白疑点重重的“叛国”都不是邪恶。但如果将三女巫视为邪恶的替罪羊，将王朝变迁归咎于人生的虚无或王权的合法性，这就是对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简化，是对真实存在的“问题”的忽视，是伊格尔顿所谓“非理性的偏见”^⑰，是真正的作恶。《麦》中凯士纳斯道，“为了拔除祖国的沉痾，让我们准备和他共同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5.2.27-29），伊格尔顿对文化、人生意义、邪恶、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问题的关注亦体现出21世纪西方文学批评面对新情势、新问题，对自身工作的意义和当下性的反思。

谈及如何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冲突和恐怖行为，伊格尔顿在《论邪恶》的结尾警示读者：“越多的暴力，就会滋生出越多的恐怖，就会让更多的无辜生命陷入险境。因此，将恐怖主义定义为邪恶，其实会不断地恶化这一问题；而让这个问题变得更糟的是，你会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你所谴责的野蛮行径的同谋。”^⑱有意思的是，伊格尔顿并未提及或并未注意到，《麦》不仅指向了邪恶问题，而且提出了医治邪恶之法。第四

幕第三场，马尔康谈及“君王之症”，该病“连名医都束手无策”，但爱德华却能“妙手回春”，因为爱德华拥有医治的“异能”“预言之才”以及“他（爱德华）的美德感天格地”（4.3.152-159）。“君王之症”实际上是淋巴结核（scrofula），传说此病一经国王触摸即可治愈，又称“摸治”（The Royal Touch）。现代医学表明，由于国王的触摸会给予病人极大信心，可以提升患者的免疫力，确有可能治愈淋巴结核。^④若将“君王之症”（The King's Evil）与“邪恶”（Evil）联系起来，我们或可发现医治邪恶的两种不同方法及其相反效果：邓肯下令麦克白暴力平叛，但麦克白却成了新的叛徒，“君王之症”不断增生，以至于“一切外科手术无法医治”（4.3.152），最后反噬邓肯；而忏悔者爱德华行使神力，摸治“君王之症”，却使病人“霍然而愈”。这样的对比，显示“邪恶”无法通过暴力剪除；邪恶必须被正视、言说和触摸。联系到詹姆斯一世时期英苏合并、议会纷争、恐怖阴谋和社会动荡的现实，作者或在暗示：社会焦虑和冲突不可能通过国家暴力进行剪除，只能正视、接纳和转化。这不仅适用于新兴的斯图亚特王朝、继位的詹姆斯一世，也是当今世界面对恐怖主义，弥合纷争、求同存异的关键。

四、结语

在《人生的意义》中，伊格尔顿引用了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的一则轶事：传言这位女诗人临死前不断询问：“答案是什么？”，最终却喃喃：“但问题是什么？”^⑤莎士比亚让《麦》中的秘密隐身在医生和侍女的沉默中，隐身在被流放的女巫、被杀死的麦克白、被推下王位的邓肯的子孙身后，隐身在整个世界的无序和永无止境的循环中，隐身在“医生”无法治愈、无法言

说的隐疾之中，呈现出一个问题重重、却难以言说的世界。这既是文学阐释的难度所在，也是文学的意义和永恒的魅力所在。

21世纪世界局势的多元和复杂需要文学评论者不仅面对作品内部的“问题”，还必须不断反思我们自身和文化中存在的“问题”。体现在早期现代英国文学研究中，一是对政治和现实问题的更加关注；二是新历史主义“颠覆/抑制”的二元对立观受到挑战，文学评论走向多元化、细节化；三是跨学科研究持续深入，尤其是文史互证的趋势明显。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也不再限于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而是开始与自然科学交叉融合，导致文学认知论、文学达尔文主义研究等的兴起。^⑥

1997年，随着国际交流合作的深入和地区冲突的加剧，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中预言，“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⑦而在近二十年后出版的《剑桥世界莎士比亚导论》（*The Cambridge Guide to the Worlds of Shakespeare*, 2016）中，政治学家的预言得到了来自文学批评领域的共鸣：该两卷本巨著的标题直接使用了复数的“世界”（worlds），指出英国乃至英语世界已不是莎士比亚研究的唯一中心，莎士比亚作品在各个时代、国别、民族和领域的阐释和传播，彰显出各自不同、却又彼此平等的价值观、文化和文明。本文由于篇幅和论述重点所限，主要集中于英美莎学，并未专门讨论中国、日本、非洲、阿拉伯地区的莎学批评状况。但研究英语国家之外的莎评范式，探讨各国莎评与英美等传统莎学世界中心的区别、联系和互动，不仅对各国的文学史研究意义重大，而且预示着新的莎士比亚批评范式转向，在此一并提出，留待未来探讨。

① 本文对莎士比亚戏剧原文的引文均取自朱生豪的译本，行数标记则以阿登版《莎士比亚全集》为准。（后文出自该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记行数，不再另注。）伊格尔顿的引文来自程朝翔，其他引文若无注明均为本文作者翻译。

② “麦克白的诅咒”的来源、背景和历史，参见 Richard Huggett, “Supernatural on Stage”: *Ghosts and Superstitions of the Theatre*, New York: Taplinger, 1975, pp. 153-211.

③ Terry Eagleton, “Preface to the Anniversary Editi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pp. iix, ix.

④ Rebecca M. Herzig, “The Woman beneath the Hair: Treating Hypertrichosis, 1870-1930,” *NWSA Journal*, vol. 12, no. 3, 2000, p. 52.

⑤ Suparna Roychoudhury, *Phantasmatic Shakespeare: Imagination in the Age of Early Modern Science*, Ithaca;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137-63.

- ⑥ Joanna Levin, "Lady MacBeth and the Daemonologie of Hysteria," *ELH*, vol. 69, no. 1, 2002, pp. 21 – 55.
- ⑦ Charles R. Forker, "Symbolic and Thematic Impoverishment in Polanski's Macbeth," *Medieval & Renaissance Drama in England*, vol. 25, 2012, p. 195.
- ⑧ Matthew Biberman, "Shakespeare after 911," in Matthew Biberman and Julia Reinhard Lupton, eds., *Shakespeare after 911: How a Social Trauma Reshapes Interpretation*,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2011, p. 7.
- ⑨ Amanda Kane Rooks, "Macbeth's Wicked Women: Sexualized Evil in Geoffrey Wright's Macbeth," *Literature/Film Quarterly*, vol. 37, no. 2, 2009, pp. 151 – 2.
- ⑩ ⑤ "Introduction," in Sandra Clark and Pamela Mason, ed. *Macbeth*, London: Bloomsbury, 2015, pp. 6, 35 – 38.
- ⑪ ⑫ 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1, pp. 626 – 7, 663. 译本参考基思·托马斯:《巫术的兴衰》,芮传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92–393、429页,有改动。
- ⑬ Robert Poole, "Polychronicon: Witchcraft History and Children: Interpreting England's Biggest Witch Trial, 1612," *Teaching History*, no. 147, 2012, p. 36.
- ⑭ Stephanie Chamberlain, "Fantasizing Infanticide: Lady Macbeth and the Murdering Mother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ollege Literature*, vol. 32, no. 3, 2005, pp. 72 – 91.
- ⑮ Mary Floyd – Wilson, "English Epicures and Scottish Witches," *Shakespeare Quarterly*, vol. 57, no. 2, 2006, p. 161.
- ⑯ ⑰ Stephanie Irene Spoto, "Jacobean Witchcraft and Feminine Power," *Pacific Coast Philology*, vol. 45, 2010, pp. 58, 67.
- ⑱ Christopher Marlowe, *The Tragical History of Doctor Faustus*, 1604;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Tempest*, 1611; William Rowley, Thomas Dekker and John Ford, *The Witch of Edmonton*, 1621.
- ⑲ Bryan Adams Hampton, "Purgation, Exorcism, and the Civilizing Process in Macbeth,"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 – 1900*, vol. 51, no. 2, 2011, p. 332.
- ⑳ 龚蓉:《“作为历史研究的文学研究”:修正主义、后修正主义与莎士比亚历史剧》,《外国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第192–3页。
- ㉑ B. L. Reid, "Macbeth and the Play of Absolutes," *The Sewanee Review*, vol. 73, no. 1 (Winter, 1965), p. 19.
- ㉒ George Walton Williams, "Macbeth: King James's Play," *South Atlantic Review*, Vol. 47, No. 2 (May, 1982), pp. 18 – 19.
- ㉓ Stuart M. Kurland, "Hamlet and the Scottish Succession?"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 – 1900*, vol. 34, no. 2, 1994, pp. 280 – 1.
- ㉔ Robert Appelbaum, "Shakespeare and Terrorism," *Criticism*, vol. 57, no. 1, 2015, p. 31.
- ㉕ David Scott Kastan, *Shakespeare After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177.
- ㉖ Rebecca Lemon, "Scaffolds of Treason in *Macbeth*," *Theatre Journal*, vol. 54, no. 1, Tragedy (Mar., 2002), pp. 31 – 2.
- ㉗ Stephen Greenblatt, *Shakespeare's Freedom*,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p. 75.
- ㉘ Robert Pack, *Willing to Choose: Volition and Storytelling in Shakespeare's Major Plays*, Sandpoint, Idaho: Lost Horse Press, 2011, p. 171.
- ㉙ Howard Marchitello, "Speed and the Problem of Real Time in *Macbeth*," *Shakespeare Quarterly*, vol. 64, no. 4, 2013, p. 448.
- ㉚ Graham Holderness and Bryan Loughrey, "Shakespeare and Terror," in Matthew Biberman and Julia Reinhard Lupton, ed., *Shakespeare after 911: How a Social Trauma Reshapes Interpretation*,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2011, p. 44.
- ㉛ ㉜ ㉝ Terry Eagleton, *The Meaning of Life*,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5, 70 – 1, 70 – 1.
- ㉞ 《创世记》1章31节。《圣经》,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印行。
- ㉟ ㊱ ㊲ ㊳ ㊴ Eagleton, *On Evil*, New Haven; London: Yale UP, p. 61、64、79、81、122、158、159.
- ㊵ "The King's Evil And The Royal Touch,"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1, no. 2664, 1912, pp. 146 – 7.
- ㊶ 参见 Mary Thomas Crane, *Shakespeare's Brain: Reading with Cognitive Theor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Joseph Carroll, "An Evolutionary Paradigm for Literary Study," *Style*, vol. 42, no. 2 – 3, 2008, pp. 103 – 34. 因这些研究的讨论重点不在《麦》剧,故本文并未涉及。
- ㊷ 塞缪尔·亨廷顿,“中文版序言”,《文明的冲突》,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1页。